

敦煌藏經洞出土北魏《華嚴經》寫本研究

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 助理教授
崔中慧

摘 要

敦煌藏經洞出土的文獻中，有一批紀年北魏宣武帝延昌年號的《華嚴經》寫本，初步考察，至少有九件寫本殘片的年代均抄寫於 513 年，但分別於不同日期由不同的寫經生所抄寫。由於《華嚴經》卷帙龐大，抄寫一部需要耗費相當長的時間與人力，北魏宣武帝年號的這幾件是現存僅次於北涼時期，保存紀年寫本殘卷最多、年代日期抄寫最集中的一批，它反映當時《華嚴經》的重要性與在社會上的流傳，是很值得關注的現象。是何原因在北魏宣武帝延昌二年元恪會大力推動《華嚴經》思想？本文首先從北魏宣武帝時期的相關人物探討其歷史背景；其次經由敦煌寫經題記說明當時敦煌官方寫經組織與寫經生，與龍門石窟的石刻題記銘文之關係，探討敦煌與洛陽之間佛教發展的相互影響。此外，由寫經與碑刻銘文書法分析，進一步探究北魏佛經書寫所具南方書風及其成因。

關鍵詞：華嚴經、敦煌、佛教寫經、北魏、龍門石窟

一、引言

漢文佛教經典的流傳與大藏經的形成，在印刷術還未興起之前屬於寫本時期，漢文寫本藏經的研究，迄今以方廣錫所著《中國寫本大藏經研究》較為系統全面，然其重點以八至十一世紀區間為主。¹在八世紀前，從三至七世紀是寫本藏經的醞釀與成熟階段，還未有系統研究，此階段不但是大藏經的源頭，同時也是書籍由書寫到刻本的重要轉折關鍵，其中錯綜複雜的文化因素還有待探討。以下先從敦煌與吐魯番出土《華嚴經》的相關寫本為基礎，初步考察其與初期大藏經形成之關係。

關於《華嚴經》的寫卷，初步考察敦煌藏經洞出土大約有 220 號（件）；而根據《敦煌學大辭典》共約有 300 號（件），² 這數字還不包括吐魯番出土文獻。³筆者初步整理敦煌藏經洞與吐魯番所出土的文獻，在西元 550 年以前早期有紀年或可推測年代的《華嚴經》寫本殘卷共有 12 件，除了年代最早為北涼時期以外，其次為北魏宣武帝時期的至少有九件。現根據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著錄，將宣武帝時期有紀年的《華嚴經》以及相關寫本列於附件【表：敦煌吐魯番出土北涼至北魏《華嚴經》與相關寫卷】。針對敦煌這批寫經，方廣錫說：「進入南北朝，有一個現象值得我們注意，北魏永平、延昌年間，由典經師令狐崇哲等人經手，集中抄寫過一批經典。……」⁴由於其年代集中在北魏永平、延昌年間，令人矚目也不禁產生疑問，究竟什麼原因會突然間出現這批寫經？這特殊的現象，是否產生於某種社會或歷史因素。在探討北魏延昌年間《華嚴經》寫本之前，先來了解宣武帝時期的佛教背景。

二、北魏宣武帝時期的佛教發展

北魏宣武帝元恪（483-515 年）與胡太后均深諳佛理，宣武帝曾宣講《維摩詰經》，胡太后也能登座宣講佛法，二人推動佛教文化不遺餘力，於佛教之發展有諸

¹ 方廣錫，《中國寫本大藏經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² 此數字係李海峰根據施萍婷《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的資料，並參照《敦煌學大辭典》，並未包含散藏於其他國家的數目。參李海峰：〈敦煌遺書中的早期《華嚴經》及其相關文獻〉，《中國文化研究》2008 年第 3 期，頁 96-102。

³ 敦煌與吐魯番的文獻資料來源包括：（1）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90 年）；（2）薄小瑩：《敦煌遺書漢文紀年卷編年》（長春：長春出版社，1990 年）；（3）王素、李方：《魏晉南北朝敦煌文獻編年》（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 年）。（4）王素：《吐魯番出土高昌文獻編年》（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 年 1 月）；（5）施萍婷：《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 7 月）；（6）中村不折著，李德范譯：《禹域出土墨寶書法源流考》（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 8 月）。

⁴ 方廣錫，《中國寫本大藏經研究》，頁 17。

多貢獻，其推動佛教文化藝術上的成就，可以從三方面來看：

（一）積極建立佛教寺、塔、石窟

延續北涼的佛教發展，北魏定都平城時期國勢已強。在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政策影響之下，為北魏遷都洛陽奠定厚實的基礎，至宣武帝時期宗教文化政治皆盛極一時。根據《北史》中記載，那興盛之狀況是「自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建寺立塔開窟造像立碑也達到最興盛，史料記載，僅延昌年間（512—515年），北魏各州郡的僧尼寺廟，共有一萬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僧徒更是不計其數。當時東西商旅經貿交流頻繁，加上皇室護持提倡，使得佛教僧徒亦絡繹於途，印度與西域來到洛陽的僧人之多，必須建立寺院來供養外國僧人。《洛陽伽藍記》記載在洛陽永明寺就是專為胡僧所建，供養外國僧人規模達三千人之多。宣武帝去世以後，胡太后崇佛更甚於前，除了於龍門石窟開窟造像，洛陽地區所建寺院最著稱乃史籍所載之永寧寺，其規模與建築堪稱佛教建築史上之最；其他較大之皇家寺院還有瑤光寺、景明寺以及洛陽龍門伊闕石窟。⁵

宣武帝時期於洛陽龍門賓陽三洞的建造時間在 510—520 年左右，塚本善隆指出：「自北魏遷都洛陽後，龍門造像便一直興盛起來，巔峰期是在宣武（世宗）與孝明（肅宗）兩朝不到三十年之間（500-527）……此為北魏洛陽期的黃金時代，面臨著經濟力充沛與佛教空前的盛世。」⁶學者考證現存隴東地區石窟與其關係密切的有涇州南、北石窟寺，也都是此時期開鑿的。由於胡太后出生於涇州，對於故鄉情誼深厚，宣武帝永平二年（西元 509 年），宣武帝之愛將涇州刺史奚康生，於涇河北岸開鑿南石窟寺，現存 5 個洞窟。另於 510 年於蒲河、茹河交匯處東岸覆鐘山下開鑿北石窟寺，皆為隴東重要佛教遺跡。

（二）佛經翻譯與華嚴思想的開展

宣武帝在位期間，除了積極與國外僧人合作翻譯佛經。《學佛考訓》卷 6 記載：「魏宣武帝自講維摩經於式乾殿，⁷令沙門流支譯論於紫極殿，又別立永明寺、瑤光寺，凡寺一萬三千，僧二百萬。」⁸宣武帝邀請負責佛經翻譯的高僧有菩提流支與勒那摩提。

⁵ 《釋氏稽古略》卷 2：「魏世宗宣武帝作瑤光寺未就（516），是歲胡太后建永寧寺，皆在宮側。又作石窟寺於伊闕口，金像高丈六尺者一，如中人者十，玉像二。為九層浮圖，高九十丈，上剎復高十丈，靜夜鈴鐸聲聞十里。自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北史）。」（《大正藏》：《釋氏稽古略》，CBETA, T49, no. 2037, p. 796 a19-24。）

⁶ 塚本善隆（林保堯，顏娟英譯），《龍門石窟：北魏佛教研究》（新竹市：覺風佛教藝術文化基金會，2005 年），頁 13。

⁷ 魏晉洛陽宮城北宮七殿之一。

⁸ 《學佛考訓》卷 6（《學佛考訓》，CBETA, J34, no. B295, p. 14c11-13。）

1. 菩提流支

影響北魏時期佛教思想發展的關鍵人物，首推三藏法師菩提流支，⁹菩提流支是北印度人，北魏宣武帝永平元年（508）時從蔥嶺來到洛陽，宣武帝特令其於永寧寺主持佛經翻譯，與七百位外國僧人共同合作翻譯佛經，得到北魏皇室的四事供養（衣被、飲食、臥具、醫藥）。菩提流支從洛陽到鄴都，翻譯與宣講佛經。翻譯佛經總計三十九部，一百二十七卷，包括許多重要經論，他與勒那摩提合作翻譯《十地經論》，這是《華嚴經》〈十地品〉的註釋論書，¹⁰北魏宣武帝非常重視並親自參與筆受。另外合作的有沙門僧朗、道湛及侍中崔光等皆參與其譯場筆受，菩提流支在中國弘法二十餘年，天平年間（534-537）還在，後不知所終。¹¹

菩提流支主要弘揚佛學思想中的涅槃與華嚴義學，同時他對淨土思想亦影響深遠，淨土祖師曇鸞（476—542 年）曾得到其傳授《觀經》之淨土法門修法。當時曇鸞求法殷切，亟欲尋求解脫大法，到了洛陽，遇見菩提流支，於是便向菩提流支請示佛教是否有比道家修煉長生還要好的修行方法，菩提流支告訴他，道法怎能與佛法相比，仙道的長生不死終究不免輪迴，但若依循佛陀教導的《觀經》修行可以解脫生死，於是便將《觀經》傳授給曇鸞，曇鸞頂受此經法後便將仙經焚之，從此便依《觀經》修行弘化於當時，頗受北魏孝靜帝的重視，賜號「神鸞」，並令曇鸞住持并州大寺（并州即今之太原，并州大寺學者考證為開化寺），晚年時住在汾州北山石壁玄中寺。¹²

2. 勒那摩提（寶意）

另一位在宣武帝時期對於《華嚴經》普及影響頗深的高僧是勒那摩提，勒那摩提又名寶意，於北魏永平初年（508-511）來到中國。勒那摩提在太極殿翻譯佛經，菩提流支在紫極殿翻譯佛經。勒那摩提擅長《華嚴經》與《十地經論》，宣武帝請其宣講華嚴，頗能深入闡釋華嚴精義。據說有一次當他正於高座上宣講《華嚴經》，忽然一位形似天官的人手持笏板上有勒那摩提名字，對他說天帝要請法師去講華嚴經，勒那摩提說，現在這場講經法會還未結束，等我講經結束後再去，況且法會僅我一人也無法進行，還需要有都講、香火、維那、梵唄共同前往才行。之後，當勒那摩提那場法會結束，見到天官再度來迎請，天官還同時邀請了都講香火、維那、梵唄等僧眾同赴天帝處去宣講華嚴。不可思議的是，只見勒那摩提當場含笑向大眾

⁹ 《佛光大辭典》，p5204（https://www.fgs.org.tw/fgs_book/fgs_drser.aspx）

¹⁰ 《十地經論》卷1：「以永平元年歲次玄枵四月上日，命三藏法師北天竺菩提留支，魏云道希；中天竺勒那摩提，魏雲寶意，及傳譯沙門，北天竺伏陀扇多，並義學緇儒一十餘人，在太極紫庭譯出斯論十有餘卷。」（《大正藏》：《十地經論》，CBETA, T26, no. 1522, p. 123b1-5。）

¹¹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1：（《大正藏》：《續高僧傳》，CBETA, T50, no. 2060, pp. 428a22-429c5。）

¹²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6：（《大正藏》：《續高僧傳》，CBETA, T50, no. 2060, p. 470b23-c4。）

告辭，奄然卒於法座上，其餘幾位都講等僧人也隨之往生。此靈瑞感應事件發生在延昌時期，在某種程度上不但對於華嚴在北方社會上的普及有影響，也更堅定了宣武帝對於佛教的信心。

根據《續高僧傳》卷 1 記載：

……初寶意沙門神理標異，領牒魏詞偏盡隅奧，帝每令講華嚴經，披釋開悟精義每發。一日正處高座，忽有持笏執名者，形如大官，云奉天帝命來請法師講華嚴經意，曰：今此法席尚未停止，待訖經文當從來命。雖然法事所資獨不能建，都講香火維那梵唄咸亦須之，可請令定，使者即如所請見講諸僧。既而法事將了，又見前使，云：奉天帝命故來下迎，〔寶意〕乃含笑熙怡告眾辭訣，奄然卒於法座，都講等僧亦同時殞，魏境聞見無不嗟美。¹³

3. 曇無最

與勒那摩提同時期弘揚華嚴的僧人還有曇無最（曇謨最或釋曇無最），出生於河北武安（今河北省邯鄲市），生卒年不詳，自幼即對佛理有不凡悟性，善於禪律，領導僧徒一千人，擅長宣講《涅槃》與《華嚴》。其道德修為盛名遍及朝野，頗受當時皇帝重視並勅令住持洛陽融覺寺，被人尊稱為羅漢。菩提流支與其同時代，對曇謨最禮敬有加，尊稱他為菩薩。菩提流支閱讀曇謨最所寫《大乘義章》之後，讚嘆其義微妙，於是將此《大乘義章》以胡文書寫流通於西域，西域沙門閱讀曇無最所寫《大乘義章》莫不對曇謨最恭敬有加，遙向東方漢地禮敬之，並尊稱曇無最是「東方聖人」、「東土菩薩」。

根據《續高僧傳》卷 23 記載：

釋曇無最，姓董氏，武安人也。靈悟洞微，淦寢玄祕。少稟道化名垂朝野……〔曇無〕最德洽釋宗，屢當時望，後勅住洛都融覺寺，寺即清河文獻懌所立，廊宇充溢，周于三里。最善弘敷導，妙達涅槃華嚴，僧徒千人，常業無怠。天竺沙門菩提留支見而禮之，號為東土菩薩。嘗讀最之所撰大乘義章，每彈指唱善。翻為梵字，寄傳大夏，彼方讀者皆東向禮之為聖人矣，然其常以弘法為任，元魏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¹⁴

上述曇無最住持的融覺寺是北魏清河王元懌（487-520）所立，規模壯觀，根

¹³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 1：（《大正藏》：《續高僧傳》，CBETA, T50, no. 2060, p. 429a17-b4。）

¹⁴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 23〈曇無最〉（《大正藏》：《續高僧傳》，CBETA, T50, no. 2060, pp. 624b22-625a18。）

據《洛陽伽藍記》卷四《城西·融覺寺》所記載，寺觀廊宇建築綿延有三里之遙，而佛殿僧房也超過一里之規模。¹⁵

由菩提流支、勒那摩提與曇無最三位宣武帝時期的高僧，分別擅長於翻譯佛經或弘宣華嚴經典，可推知他們對華嚴經在北魏的普及必定產生具體的影響。

三、敦煌與吐魯番出土《華嚴經》寫卷

由前述宣武帝朝的僧人活動與其推展華嚴的影響之下，進而再檢視敦煌藏經洞出土的《華嚴經》寫卷。由附件【表】所列《華嚴經》殘卷，不同日期、卷號的殘卷，我們注意到現存北魏有明確紀年（513年）就有九件，都是在北魏延昌二年所書寫供養的佛經。可以推測，其他敦煌或吐魯番保存至今的寫本，沒有題記，但產生於同一時期的可能還有很多，在此，先考察宣武帝時期書寫華嚴的活動或相關的人物。

（一）敦煌寫經與洛陽之關係

探討這幾件《華嚴經》寫本產生的原因，除了受到前述幾位高僧在宣武帝時期的影響，使得佛教與華嚴思想在北方開展。另外值得注意的還有一位北魏宣武帝朝宮廷大將安豐王元延明（484—530年）。

據《華嚴經傳記》、《辯正論》所載，元延明博學有文才，負責掌管國家金石碑碣事務，他與元熙（公元515年卒）是宣武帝時的大將，也都是虔誠護持佛法的佛弟子，二人不但建立道場開齋講經法會，亦曾供養以香汁研墨所書寫的《華嚴經》一百部，以及金字書寫於素絹的《華嚴經》一部。這些《華嚴經》以珍貴的四寶函盒裝好放置在櫥櫃中，若於靜夜良辰清齋行道，會見到保存的經典放出五色神光照耀樓臺，令觀者倍增道心。《華嚴經傳記》卷5記載：

魏安豐王延明、中山王熙，竝以宗室，博古學文。俱立道場齋講相續。以香汁和墨，寫華嚴經一百部，素書金字華嚴一部。皆五香厨，四寶函盛。靜夜良辰，清齋行道，每放五色神光，照耀臺宇，眾皆共觀，倍更發心。¹⁶

這是晉譯《華嚴經》自從南方翻譯出來八、九十年之後，早期佛教文獻記載抄

¹⁵ 〔北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卷4：（《大正藏》：《洛陽伽藍記》，CBETA, T51, no. 2092, p. 1017b8-18。）

¹⁶ 《華嚴經傳記》卷5：（《大正藏》：《華嚴經傳記》，CBETA, T51, no. 2073, p. 170c20-24。）；另見《辯正論》卷4（《大正藏》：《辯正論》，CBETA, T52, no. 2110, p. 514c23-28。）

寫《華嚴經》部數最多的一次記錄。雖然，現存的敦煌或吐魯番出土《華嚴經》殘片並沒有直接與元延明抄寫的《華嚴經》有關的題記，但是查考元延明的身份，發現元延明的妻子馮氏是馮熙的女兒，而馮熙是誰？是北魏洛州刺史馮晉國，至今敦煌藏經洞出土一件 479 年《雜阿毗曇心經·卷第六》，就是洛州刺史馮晉國所寫經，卷尾記載一段非常重要的題記：

雜阿毗曇心者，法盛大士之所說。以法相理玄，□籍浩博，懼昏流迷於廣文，乃略微以現約，瞻四有之局見，通三界之差別。以識同至味，名曰《毗曇》。是以使持節、侍中、駙馬都尉、羽真、太師、中書監領秘書事、車騎大將軍、都督諸軍事、啟府洛州刺史昌黎王馮晉國，仰感恩遇，撰寫十「一切經」，一一經一千四百六十四卷，用答皇施。願皇帝陛下、太皇太后，德苞九元，明同三曜。振恩闡以熙寧，協淳氣而養壽。乃作贊曰：

麗麗毗曇，厥名無比。文約義豐，捻（總）演天地。

盛尊延剖，聲類斯視。理無不彰，根無不利。

卷云斯苞·見云亦帝（諦）。諦修後翫，是聰是備。

大代太和三年歲次己未十月己巳廿八日丙申於洛州所書成訖。（圖一）

馮晉國除了供養佛經，另還以自己的家財在各地州鎮建立 72 處佛圖精舍，根據《魏書·馮熙傳》記載：「熙為政不能仁厚，而信佛法，自出家財，在諸州鎮建佛圖精舍，合七十二處，寫一十六部《一切經》。」¹⁷若從敦煌出現洛陽流傳過來的 479 年洛州刺史馮熙為皇帝供養一切經來看，具有某種程度以供養佛經報答皇恩，為國運祈福，或對皇帝皇太后祝壽的動機，也就是說，供養佛經除了可討好虔誠信佛的皇帝與皇太后，也鞏固他們在朝的政治地位。通過元延明與馮晉國這一層家族與信佛的關係，元延明有可能以其在朝的職務，對當時北魏宮廷收藏佛經產生某種程度的影響。而元延明供養的一百部《華嚴經》是在那一年所寫？無法得知，但也許在他任職宣武帝朝時期，遇到某些困難。有學者考察，自 499 年起至 514 年，北魏歷經了歷史上最頻繁的天災人禍，¹⁸據統計，在短短十五年當中就發生十五次的天災，特別是在北魏延昌元年（512 年），水災旱災頻發，還發生全國飢荒，元延明甚至以自家財產，賑濟數十戶饑民。這幾年中的飢荒是否與之後敦煌出現的延昌年寫經有關聯？不得而知，但是可以確知，這種以供養大藏經、書寫佛經來做功德

¹⁷ 〔北齊〕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頁 1818。

¹⁸ 錢龍，〈北魏安置六鎮「饑民」失誤淺論〉，《滄桑》（2007 年 1 月），頁 18-19。

消災祈福在五世紀末與六世紀初的北魏宮廷中已蔚為風氣。

印刷術還未興起之前寫本時期的漢文佛教經典中，由數量龐大的敦煌與吐魯番出土的佛經寫本可見有三類：一類是正式的官方寫本大藏經「一切經」，通常都會抄寫正本與副本，這種正式的官方寫經多採用正書或隸書書寫；第二類是佛教信徒日常個人修行用的「日常用經」；第三類是祈福發願做功德而抄寫流通的「供養經」，這部分的寫經供養者多，複本也多。¹⁹「日常用經」或者為修功德福報而書寫的「供養經」，則依個人條件不同而用各種不同書體書寫，有正書、行書、草書或隸書。

檢視敦煌藏經洞出土的北魏宣武帝永平四年（511）到延昌三年（514）《華嚴經》寫本，由典經師令狐崇哲等人經手，年代集中在北魏永平延昌年間，同時還有官方寫經生題記：「敦煌鎮官經生令狐禮太寫，典經師令狐崇哲」、「敦煌鎮經生張顯昌寫，典經師令狐崇哲」、「敦煌鎮經生和常太寫」、敦煌鎮官經生曹法壽書寫《華嚴經》卷四十一，日本收藏《華嚴經》卷四十七，是由敦煌鎮經生張顯昌寫，典經師令狐崇哲；另，法圖藏 P.2110《華嚴經》卷卅五，是由敦煌官方寫經生令狐崇哲所書寫……等等，顯示這些寫卷是出自北魏的官方寫經，這些北魏官方書寫的《華嚴經》傳達幾項訊息：

1.《華嚴經》在北魏佛教已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影響所及敦煌地區亦積極抄寫流通。

2.敦煌在北魏時期已有正式官方寫經組織，寫經生有專屬的官職。

3.敦煌北魏官方寫經組織中的成員胡漢融和，有漢人（張顯昌）、粟特人（曹法壽）、以及最常見的令狐家族寫經生，²⁰其中尤以令狐氏在北魏的官方寫經組織擔任相當重要的角色。²¹

4.供養大藏經、書寫佛經做功德消災祈福，在五世紀末與六世紀初的北魏宮廷中已蔚為風氣。

文末附件【表】中所列這批 513 年令狐崇哲所監造的敦煌鎮官方寫經中，除了九件晉譯本《華嚴經》還有一件鳩摩羅什譯的《成實論》。由敦煌官方寫經生劉廣周抄寫的 S.1547《成實論》卷 14，這是保存至今年代最早的《成實論》寫本，經

¹⁹ 鄭阿財，〈幾件極具深意的敦煌特殊寫經〉，《人乘佛刊》（2007 年 9 月第 12 期），<http://www.zg.s.org.tw/epaperSystem/periodical/9609/epaper6-2-2.htm>

²⁰ 孔令梅、杜斗城：〈十六國時期敦煌令狐氏與佛教關係探究〉，《敦煌研究》（2010 年第 5 期），頁 99-104。

²¹ 孔令梅、杜斗城：〈十六國時期敦煌令狐氏與佛教關係探究〉，頁 99-104。

核對與現存的大藏經卷號一致。這批北魏永平到延昌年間的《華嚴經》殘卷，也是歷史上保存年代最早，年份最集中，卷帙最多的一批《華嚴經》寫本。集中同幾年抄寫不同的佛經，以及同一部於不同時間抄寫不同卷，方廣錫推測這與敦煌當時進行抄寫大藏經有關，他指出：「依據敦煌遺書，則官造大藏經的時間似乎還應該提前。……」²²

前述 479 年洛州刺史馮晉國（馮熙）所寫經《雜阿毗曇心經卷第六》的卷尾題記，「…仰感恩遇，撰寫十一切經，一一經一千四百六十四卷，用答皇施…」此段題記說明馮晉國造了十部一切經，每一部有 1464 卷，他書寫供養這些佛經的目的是為了報答皇帝的恩澤。雖然《魏書》所記載其供養《一切經》的資料是十六部，在敦煌寫卷的題記所記錄則為十部，二者數字上有出入。但這資料是北魏寫經題記所記載關於寫「一切經」年代最早的記錄，也是在五世紀下半葉北方已進行造大藏經的證據。

以下，進一步以上述寫本為基礎，探討北魏時期的《華嚴經》寫本殘卷初期譯傳與書寫的軌跡，從寫經書法風格分析宣武帝朝洛陽、敦煌與南方之間的交流關係。

（二）北魏《華嚴經》寫經與南方影響

魏晉南北朝時期，佛經傳譯逐漸奠定基礎，在五世紀初期中國佛經翻譯主要有幾個中心，北方佛經翻譯在河西地區以北涼曇無讖為首，在涼州與敦煌；中原以長安鳩摩羅什譯場最具規模，貢獻卓越；南方則以南朝劉宋文帝都城建康及荊州為中心。²³晉譯六十《華嚴經》是 418 年由佛馱跋陀羅在南方揚州道場寺翻譯出來的，譯場中參與翻譯者共有一百多位，主要筆受是僧人法業。前後歷時二年，全部翻譯完後，又再歷時一年將原先胡本與漢譯本前後仔細再次核對。當時的吳郡內史孟顗、右衛將軍褚叔度為施主檀越。²⁴《華嚴經》於南方翻譯出來之後，先在南朝流通，當時在南方推動《華嚴經》最大功臣是南朝劉宋擔任荊州刺史劉義宣（415 年—454 年），是劉宋武帝劉裕的第六個兒子，是初期重要弘揚《華嚴經》的官方人物，魏道儒指出：

「…劉宋時期支持弘揚《華嚴經》的重要人物是劉義宣。他曾師事譯經名僧求那跋陀羅（約 394—468 年），446 年劉義宣出鎮荊州時，攜其同行。劉義

²² 方廣錫，《中國寫本大藏經研究》，頁 17。

²³ 船山徹，《仏典はどう漢訳されたのか： スートラが経典になるとき》（東京都千代田区：岩波書店，2013 年 12 月），頁 32。

²⁴ 〔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 9（《大正藏》：《出三藏記集》，CBETA, T55, no. 2145, pp. 60c29-61a8。）

宣鼓勵求那跋陀羅宣講《華嚴》，使該經傳播到京城以外地區。」²⁵

此外，南朝齊竟陵文宣王蕭子良（460-494）曾抄經三十六部，其中也包括《華嚴經》，²⁶此批宮廷出來的寫經必定也是書法精良之作。在高僧與帝王共同推展之下，《華嚴經》在南朝的寫本很快也就流向北方。

現存有年代可考最早的《華嚴經》寫本殘卷出土於吐魯番，是北涼王且渠安周（且亦作沮）的寫經或供養的佛經，且渠安周寫經中有《持世經》、《十住毘婆沙論》與《佛華嚴經卷第廿八》。（圖二）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持世經》（圖三）與《佛華嚴經卷第廿八》殘片都是南方書法風格的寫卷。²⁷

根據日本中村不折收錄於《禹域出土墨寶源流考》，中村不折說明如下：

《華嚴經》第廿八。長一尺七寸，存字 22 行，今隸書，鄯善出土，後款：涼王大且渠安周所供養經，廿紙。此經書體今隸中混有行體。以上二卷（另一件為十住論）均為且渠安周供養經，年號雖未書寫，但可推定其年代。²⁸

中村不折推斷這件殘片應屬北涼高昌且渠安周時期無疑，並定義其書法為「今隸書、今隸中混有行體」，而實際上這件殘片具有南方王系書風的正書（楷書）略有行書意味。這是北涼宮廷的寫經生為且渠安周書寫供養的佛經，該寫經生可能臨摹某件《華嚴經》寫本所抄寫的，也許是根據從南朝傳過來的某個寫本。在北涼的基礎上，北魏官方進行監造佛教經典，勢必會網羅中原或南方傳來的《華嚴經》寫本，傳抄並流通到敦煌。宣武帝時，北魏雖然雄踞北方，其對於南方的覬覦從未停歇，趁著南朝齊蕭寶卷（483—501 年）昏庸荒淫之際，宣武帝自 500 年開始南伐，到了 508 年北魏佔領了揚州、荊州、益州等地。

（三）書法分析

初期漢傳佛教的基礎主要奠定在漢文佛教典籍的傳譯，佛經的翻譯與書寫流通是佛教文化宣傳最重要的一環。兩漢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書法發展的高峰，開始產

²⁵ 魏道儒：〈東晉南北朝華嚴學的發展趨向〉，《世界宗教研究》（1999 年 1 月），頁 68。

²⁶ 〔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 5：「從華嚴經至貧女為國王夫人，凡三十六部，並齊竟陵文宣王所抄，凡抄字在經題上者皆文宣所抄也。」（《大正藏》：《出三藏記集》，CBETA，T55，no. 2145，p.38a16-18。）

²⁷ 參閱崔中慧，〈吐魯番出土北涼且渠安周供養《佛華嚴經》研究〉，《華嚴學報》第六期（2013 年 12 月），頁 217-261。此文中筆者考證北涼的官方典型寫經書法風格是北涼體，而關於北涼出現南方風格寫經的原因，文內有詳述，此略。

²⁸ 中村不折：《禹域出土墨寶源流考》（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頁 38。

生許多書法家與多種不同的書法風格，也是隸書向正書（楷書）轉變的關鍵階段。

東漢末年時，隸、草、楷、行各種書體皆已發展完備，而其演變的過程基本上雖然是：隸書→章草→行書→楷書，而實際上，各個書體之間並非單向一直線發展，其間有許多交叉縱橫的演變與相互激盪。如吐峪溝出土紀年 296 年《諸佛要集經》殘片為典型的西晉正書，是從鍾繇書風傳統發展而來，鍾繇的正書也是初期佛經書寫採用的書體。²⁹其後，王羲之（303-361）沿襲鍾繇傳統另創一格，王系書風成為主流。³⁰ 隨著歷史的演進，王系書風在佛教寫經書法發展的影響也逐漸出現。南方佛教寫經體富含王系書風影響。³¹ 我們從敦煌吐魯番屬於魏晉南北朝的寫卷或石刻中，可見楷書在逐步轉化，其轉化的主要原因正如裘錫圭於《文字學概要》中提到：「鍾王楷書脫胎於行書，作為碑刻上的正體來用，結體和筆法都有不夠莊嚴穩重的地方。南北朝時人已經為了這個原因，對鍾王楷書作了一些改造。不過直到唐初的歐陽詢，才較好地完成了這項改造工作。」³²

雖然裘錫圭指出鍾王楷書的演變是到了唐初歐陽詢才改造成典型的唐楷，而我們知道，歐陽詢的楷法與結構是源於魏碑，而北魏楷書書體發展成熟的例子可以從敦煌佛教寫經中發現。例如敦煌北魏寫經，471 年法藏編號 P.4506 的北魏皇興五年《金光明經》寫本，池田溫指出是：「已經完全普及了王羲之的那種圓熟的書法風格。」；³³同時，479 年的馮熙寫經也呈現南方王系書風影響。馮熙這份寫本 S.996《雜阿毗曇心經》卷第六，是敦煌現存此部佛經有紀年最早的殘卷，擔任洛州刺史的馮熙在為皇帝祈福的動機之下，必定是選擇了宮廷藏的最佳寫本為範本來恭敬虔誠地抄寫。即使馮熙的寫本並非《華嚴經》，但從馮熙的書法中已經明顯看出北魏楷書已步向成熟，除了呈現隸書過渡到魏楷風格，並融合南方王系書風的意味，為清楚說明此一複雜的演變過程，以下選擇數件從 449 年至 506 年之間寫經與碑刻書法來比較其軌跡。

筆者選擇分析的佛經範例，包括有 449 年《持世第一》、（圖三）506 年《大般

²⁹ 關於初期佛經寫本所採用的書體例如以 296 年《諸佛要集經》的正書（楷書）為例，其與書法史上的書法家書法風格之關係源頭，請參閱崔中慧，〈流沙墨韻——敦煌吐魯番佛教寫經書法探秘〉，《藝術學》28（臺北：國立藝術大學，2012 年）。

³⁰ 劉濤，《中國書法史魏晉南北朝卷》，頁 190，「王羲之的書法師承，大致的綫索是：少學衛夫人，得正書的技法。十餘歲至二十歲，改師叔父王廙，得眾體之技法。二十歲以後，師師之所師，正書、行書宗尚鍾繇，草書效法張芝。」

³¹ 王菡薇、陶小軍合著，《敦煌南朝寫本書法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年）。

³²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9 年），頁 115。關於正書（楷書）的形成，另請參崔中慧，〈絲路上的「書道」——揭開書法史上楷書起始之謎〉，《典藏讀天下》（2013 年 7 月），頁 48-55。崔中慧，〈流沙墨韻——敦煌吐魯番佛教書法探秘〉，《藝術學》第 28 期，（2012 年 5 月），頁 9-50。

³³ 池田溫著，（張銘心、郝鐵君譯），《敦煌文書的世界》（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頁 37。

涅槃經》、(圖四) S.996《雜阿毗曇心經》卷第六、(圖一) 495 年《牛橛造像記》。(圖五) 選擇字例以正書(楷書)成熟所發展出的筆劃或部首為例,包括:「一」橫畫、「人」或「大」、「心」、「戈」、「為」等等,其中選了兩件有紀年的石刻為標尺,分別作為北涼與北魏時期的範例,來比較北涼到北魏之間的書法軌跡。(圖九) 首先要注意的是石刻書法的銘刻與紙張的書寫是不同的,即使同一個書法家書寫在宣紙上的字跡,與他直接書丹上石,石刻工匠用刀刻的筆鋒還是與原來的毛筆書跡不同,所以必須透過刀鋒看筆鋒。³⁴ 經過排比,圖九所示的書跡明顯傳達了幾個訊息:

1.首先,是 449 年的南方風格寫經已出現在北方,南方王系書風開始浸潤北涼寫經書法;

2.其次,從字體結構與部首「心」、「戈」書寫的特徵,可見 479 年北魏馮晉國書寫《雜阿毗曇心經》卷第六已是發展成熟的楷書。

3.比較龍門石窟 495 年《牛橛造像記》的「人」字撇與捺的書法筆勢,與 449 年《持世第一》的「大」字撇與捺書寫很像,還有「心」部首寫法與《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結構也類似,「咸」的結構也類似《持世第一》的「歲」字。

4.通過這部份的書跡脈絡,展現佛教寫經書法從北涼開始即已經不斷融合南方秀逸之風,北涼書法中已開始轉型,到了北魏已發展成熟,此發展可見於法藏編號 P.4506 的北魏皇興五年(471 年)的《金光明經》寫本,還有 479 年馮晉國的《雜阿毗曇心經》卷第六。

仔細觀察 513 年令狐家族監造的一批佛經中,具有獨特的令狐氏族書法風格,可以發現,令狐家族的北魏書風,充滿了令狐氏族少數民族野逸瀟灑的筆墨趣味,除了字體慣性的右向上敬側,橫畫入筆時筆鋒鋒芒也特別突出,在撇畫與捺筆的書寫也比較奔放。(圖七、圖八) 為了探討敦煌令狐氏族寫經組織的書法風格來源,再比對幾件寫經與石刻進一步比較,於圖九中包括 479 年《雜阿毗曇心經》卷第六、495 年《牛橛造像記》、506 年《大般涅槃經》、與 513 年令狐崇哲的《華嚴經》。單字或部首範例有:「一」橫畫、「人」或「大」、「心」、「戈」、「為」、「佛」、「有」、「戈」、以及常見詞「一切」。(圖十二) 從圖十二的比較來看,令狐崇哲的《華嚴經》顯然就是追隨 479 年馮晉國《雜阿毗曇心經》卷第六與 506 年《大般涅槃經》的書法風格。令狐崇哲的書法,雖然極力認真抄寫,在模仿之中,掩蓋不了一股瀟

³⁴ 啓功,《論書絕句》(趙仁珪注釋本)(三二),詩云:「題記龍門字勢雄,就中猶屬始平公。學書別有觀碑法,透過刀鋒看筆鋒。」又「余非謂石刻必不可臨,惟心目能辨刀與毫者,始足以言臨刻本,否則見口技演員學百禽之語,遂謂其人之語言本來如此,不亦堪發大噱乎!」(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 年 10 月),頁 64。

灑率性而不拘，與 506 年譙良顥的書法《大般涅槃經》比較，《大般涅槃經》的書寫則顯得沉穩蘊藉而矜持。從書跡的筆墨之間，也透露出寫經生南北方的性格不同，漢人與少數民族的文化差異。

以上以敦煌《華嚴經》寫本為基礎，梳理《華嚴經》書寫流傳的軌跡，追溯南方譯場傳譯出來的寫本為源頭，有可能南朝寫本傳到中原，寫經生依據南朝本抄寫複本，傳抄而流通傳入敦煌或吐魯番。由北魏洛州刺史馮熙的寫經流傳到敦煌，說明敦煌與洛陽之間的經典與文化有著密切交流的關係。依年代排序幾件紀年之敦煌寫經來比較書法風格，觀察馮熙 479 年北魏的寫經書法實蘊含南方書風影響。例如 506 年荊州竹林寺譙良顥的南朝寫經《大般涅槃經》，與 495 年的魏碑石刻《牛橛造像記》比較，並比對 513 年令狐崇哲書寫的《華嚴經》，可以觀察到字體的筆法與結構之一脈相承。從寫經的書法軌跡中，也清楚顯示宣武帝年間敦煌令狐氏族所寫《華嚴經》已充滿了南北書風交融的痕跡。

四、初期《華嚴經》寫本與一切經之關係

在寫本流傳的歷史過程中，有幾位抄寫供養《華嚴經》值得注意，一是南朝齊竟陵文宣王蕭子良曾抄經三十六部，另一是北魏宮廷大將元延明曾抄寫流通一百部華嚴經。同時馮熙作為宮廷大臣抄寫一切經來報答皇恩，說明當時北魏針對大藏經做全面的抄寫的官方活動。方廣鋁曾推測：「敦煌鎮官經生所寫大藏經的發現，說明北魏敦煌佛教信仰甚為興盛，起碼在河西一帶，抄經已經成為官方的事業。也說明當時佛教在社會上佔據重要地位。」³⁵

而這種抄寫與流通佛經的現象，也反映在《華嚴經》寫本南北流通的文化交流上，或可追溯至北涼。筆者於 2013 年發表〈吐魯番出土北涼沮渠安周供養《佛華嚴經》研究〉，探討《華嚴經》在南方於五世紀翻譯出來以後不久，北涼宮廷寫經僧道養即已抄寫並流傳至吐魯番。³⁶ 另外，由北涼石碑石塔銘刻文字，與佛經殘卷比較研究，考證北涼宮廷有幾位官方寫經生，當時國家佛經翻譯與佛教書寫文化是有組織有系統在發展的。³⁷ 從北涼的佛教寫經書法風格分析，探討所謂「北涼體」與北涼寫經生，並說明這一階段書法風格濃厚的胡風墨韻，是書法史上西域僧

³⁵ 方廣鋁，《中國寫本大藏經研究》，頁 18。

³⁶ 崔中慧，〈吐魯番出土北涼沮渠安周供養《佛華嚴經》研究〉，《華嚴學報》第六期（2013 年 12 月），頁 217-261。

³⁷ 崔中慧，〈由《涼王大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探討北涼宮廷寫經與官方組織〉，（收錄於王三慶，鄭阿財主編，《2013 敦煌吐魯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灣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出版，2014 年 12 月。）

人所留下空前絕後的珍貴書跡。³⁸ 根據北涼的寫經與石塔刻經，筆者 2014 年發表〈德國收藏吐魯番出土早期《華嚴經》寫本殘片研究〉一文，探討早期《華嚴經》寫本於吐魯番流通的情況，通過北涼時期的碑刻、石塔與寫經殘片書法比較，說明在五世紀初期自東晉佛陀跋陀羅翻譯出《大方廣佛華嚴經》以後，北方很快即開始抄寫流通。³⁹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北涼王且渠安周已開始供養佛教寫經，北涼宮廷寫經生也參與書寫供養佛經，北涼寫經生所抄寫的佛經中，收集了南北不同佛經翻譯譯場所出佛經，除了上述南方所出晉譯《華嚴經》出現在北涼，也有鳩摩羅什譯場翻譯出來的不同佛經，北涼供養與抄寫的經典涵蓋了經、律、論。此現象或可說明北涼官方已開始進行系統收集中原與南方傳來的佛經並抄寫複本，不排除北涼已具初期寫本時期大藏經形成階段。⁴⁰

五、小結

本文首先由佛教與歷史文獻探討宣武帝時期推動華嚴思想主要的三位僧人菩提流支、勒那摩提與曇摩最，對初期華嚴思想的弘揚奠基有重要的貢獻。通過敦煌藏經洞出土北魏宣武帝時期的《華嚴經》寫卷，首先探討《華嚴經》寫卷的傳布歷史背景，與經典書寫傳布的地理軌跡。並從北魏《華嚴經》寫卷與石刻所呈現的書跡脈絡，說明北魏佛教寫經體在洛陽與敦煌之間的交流關係。同時，根據北魏馮熙寫經題記出現「一切經」，以及供養多部佛經的記載，反映了當時宮廷收藏與流通佛教藏經的政策，推測北魏官方有計劃地進行編纂「一切經」，也就是大藏經。而此活動或許在北涼時期已有初步的展開。由北魏宣武帝時期這批敦煌官方寫經，反映了北魏時期正書（楷書）書體發展更臻完備，在字形結體四方的方塊結構或楷書筆法的成熟，都為後來印刷術發展奠定了基礎。

³⁸ 崔中慧，〈墨影胡韻—北涼時期宮廷佛教書法〉，《九州學林學報》，No.35, May 2015，香港城市大學。

³⁹ 崔中慧，〈德國收藏吐魯番出土早期《華嚴經》寫本殘片研究〉，（收錄於陳一標主編，《2014年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華嚴蓮社，2014年10月），頁23-48。

⁴⁰ 方廣錫，《中國寫本大藏經研究》，頁14-15。

【表】敦煌吐魯番出土北涼至北魏《華嚴經》與相關寫卷

	收藏地/編號	寫卷名稱	朝代	年號	寫經者/供養者
455 以前	日本中村不折收藏 013 (日本書道博物館)	佛華嚴經卷第廿八	北涼 (鄯善縣吐峪溝出土)	承平十三年前	北涼王大且渠安周供養
511		成實論卷十四		永平四年七月	
512	S.1547	成實論卷十四		延昌元年八月	用紙廿八張。 延昌元年(512)歲次壬辰八月五日,敦煌鎮官經生劉廣周所寫論訖。 典經師 令狐崇哲 校經道人 洪儁
513	北圖 (散 648/新 672)	華嚴經卷八	北魏宣武帝	延昌二年四月十七日	敦煌鎮官經生令狐禮太寫,典經師令狐崇哲。
513	北京故宮	華嚴經卷四十一	北魏宣武帝	延昌二年四月十五日	敦煌鎮經生曹法壽寫,典經師令狐崇哲
513	法圖 P.2110	華嚴經卷卅五	北魏宣武帝	延昌二年六月廿三日	敦煌鎮經生師令狐崇哲
513		大智度論卷三十二		延昌二年六月	
513	延昌二年六月;	大樓炭經卷七			
513	S.9141	華嚴經卷第三十九	北魏宣武帝	延昌二年七月十五日	敦煌鎮官經生師令狐崇哲寫
513	大谷圖 (散 105/餘乙 23)	華嚴經卷四十七	北魏宣武帝	延昌二年七月十八日	敦煌鎮經生張顯昌寫,典經師令狐崇哲
513	S.2067	華嚴經卷十六	北魏宣武帝	延昌二年七月十九日	敦煌鎮經生令狐禮太寫
513	敦煌秘笈番號四 (李盛鐸:散 193)	華嚴經卷廿四	北魏宣武帝	延昌二年八月廿七日	敦煌鎮經生令狐崇哲
513	國圖新 0672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八	北魏宣武帝	延昌二年	
513	日本三井文庫北三井 051(025-14-2) 三井八郎右衛門	華嚴經卷四十六	北魏宣武帝	延昌二年	敦煌鎮經生和常太寫
514		大方等陀羅尼經卷一	北魏宣武帝	延昌三年四月	
514		成實論卷八	北魏宣武帝	延昌三年六月	
514		大品經卷八	北魏宣武帝	延昌三年七月	
522	S.2724	華嚴經卷第三	北魏孝明帝	正光三年	比丘法定寫
523	中村不折收藏 023 (日本書道博物館)	華嚴經卷第廿九	南朝梁武帝 (鄯善縣吐峪溝)	普通四年四月	梁正法無盡藏寫

引用書目

一、原典文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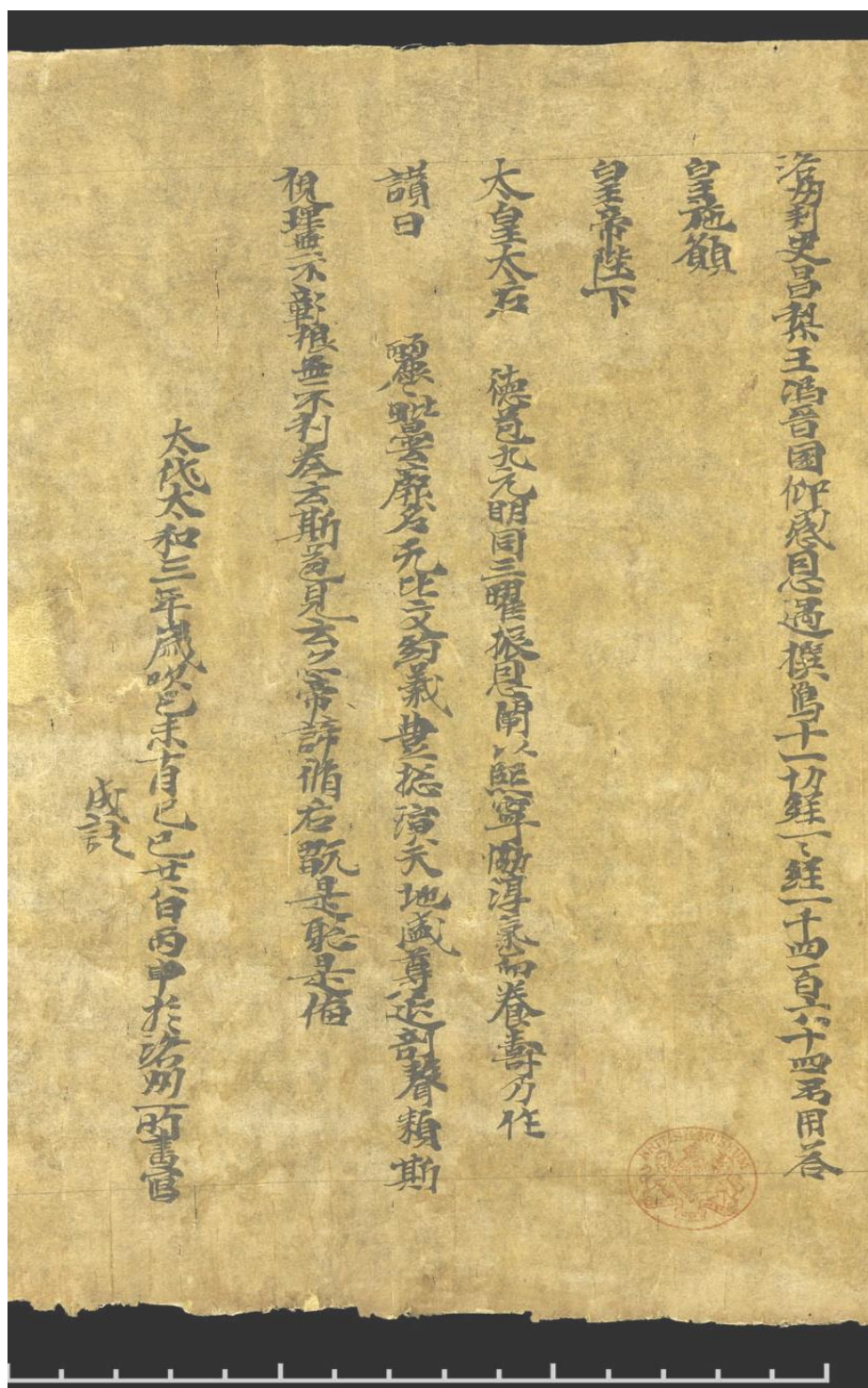
- 《十地經論》。《大正藏》冊 26，第 1522 號。
《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正藏》冊 9，第 278 號。
《出三藏記集》。《大正藏》冊 55，第 2145 號。
《洛陽伽藍記》。《大正藏》冊 51，第 2092 號。
《華嚴經傳記》。《大正藏》冊 51，第 2073 號。
《學佛考訓》。J34,no.B295。
《續高僧傳》。《大正藏》• 50，第 2060 號。
北齊·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二、專書、論文、網路資源等

- 王菡薇、陶小軍（2011），《敦煌南朝寫本書法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王素（1997a），《魏晉南北朝敦煌文獻編年》，（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97b），《吐魯番出土高昌文獻編年》，（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孔令梅、杜斗城（2010），〈十六國時期敦煌令狐氏與佛教關係探究〉，《敦煌研究》5，頁 99-104。
方廣錫（2003），《中國寫本大藏經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14-25。
中村不折（2003），《禹域出土墨寶書法源流考》，（北京：中華書局）。
池田溫（1990），《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2007），（張銘心、郝鐵君譯）。《敦煌文書的世界》（北京：中華書局。）
李海峰（2008），〈敦煌遺書中的早期《華嚴經》及其相關文獻〉，《中國文化研究》3，頁 96-102。
施萍婷（2000），《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北京：中華書局）。
啓功（2002），《論書絕句》（趙仁珪注釋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崔中慧（2012）。〈流沙墨韻——敦煌吐魯番佛教寫經書法探秘〉。《藝術學》28（臺北：國立藝術大學。）
——（2013a），〈由《涼王大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探討北涼宮廷寫經與官方組織〉。2013 年敦煌吐魯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成功大學。
——（2013b），〈吐魯番出土北涼沮渠安周供養《佛華嚴經》研究〉，《華嚴學報》6。頁 217-261。
——（2013c），〈絲路上的“書道”——揭開書法史上楷書起始之謎〉，《典藏讀天下》7。頁 48-55。

- （2014），〈德國收藏吐魯番出土早期《華嚴經》寫本殘片研究〉，2014年第三屆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華嚴專宗學院。）
- （2015），〈墨影胡韻－北涼時期宮廷佛教書法〉。《九州學林學報》35，（香港：香港城市大學。）
- 船山徹（2013），《仏典はどう漢訳されたのか：スートラが經典になるとき》，（東京都千代田区：岩波書店。）
- 塚本善隆（林保堯，顏娟英譯）（2005），《龍門石窟：北魏佛教研究》，（新竹市：覺風佛教藝術文化基金會）。頁13。
- 鄭阿財（2007），〈幾件極具深意的敦煌特殊寫經〉，《人乘佛刊》12。
- 劉濤（2009），《中國書法史魏晉南北朝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錢龍（2007），〈北魏安置六鎮「饑民」失誤淺論〉，《滄桑》1，頁19。
- 薄小瑩（1990），《敦煌遺書漢文紀年卷編年》，（長春：長春出版社。）
- 魏道儒（1999），〈東晉南北朝華嚴學的發展趨向〉，《世界宗教研究》1，頁65-72。
- TSUI Chung-hui 崔中慧（2010），*A Study of Early Buddhist Scriptural Calligraphy—based on Buddhist Manuscripts found in Dunhuang and and Turfan(3-5C)*，PhD thesis，（Hong Kong：Centre of Buddhist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 方廣錫，〈略談漢文大藏經的編藏理路及其演變〉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c23f390100bcyz.html（2016年1月5日檢索）
- 佛光大辭典 https://www.fgs.org.tw/fgs_book/fgs_drser.aspx（2016年1月5日檢索）

敦煌藏經洞出土北魏《華嚴經》寫本研究【圖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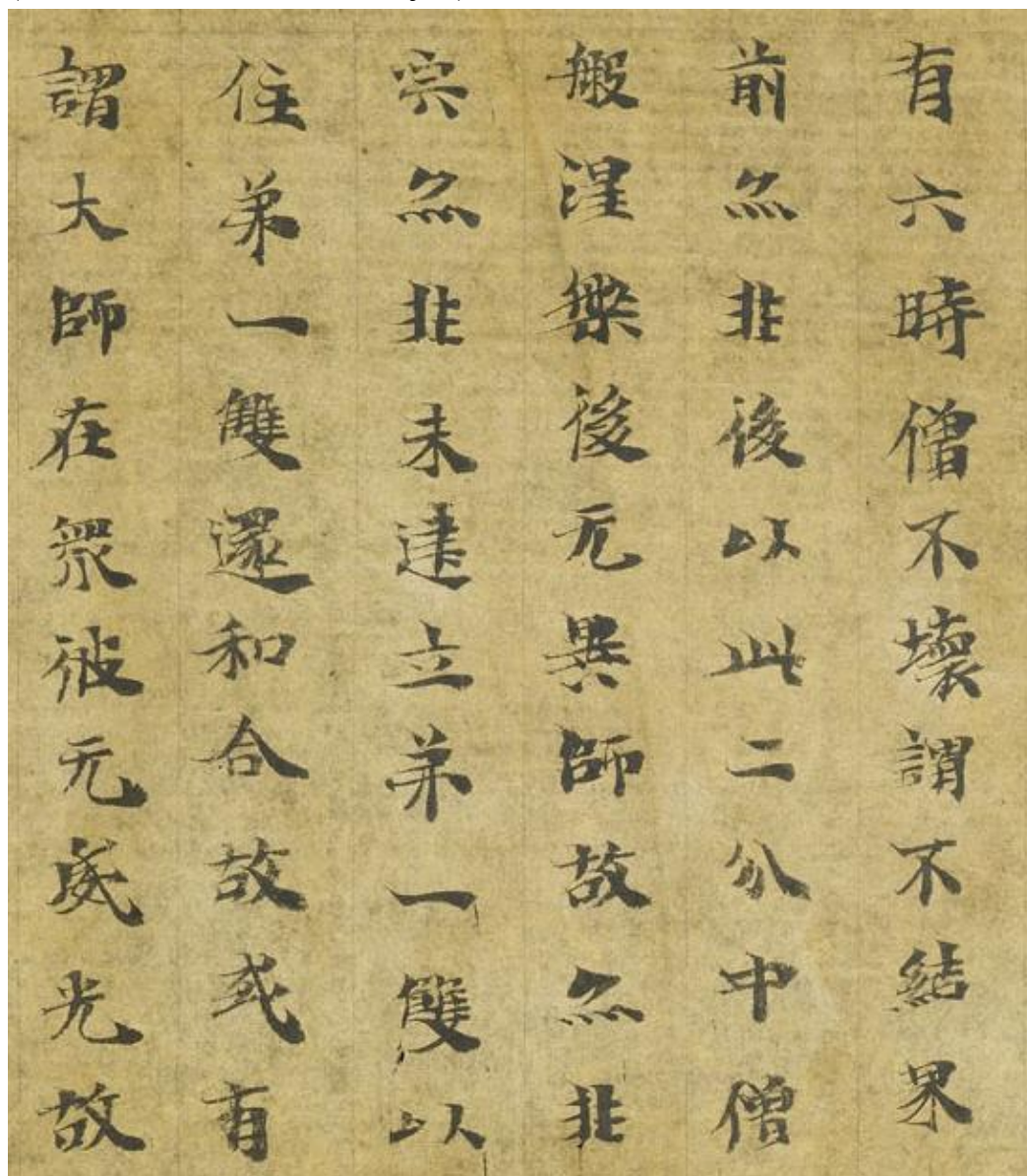


圖一. S.996, 479 年《雜阿毗曇心經·卷第六》卷尾題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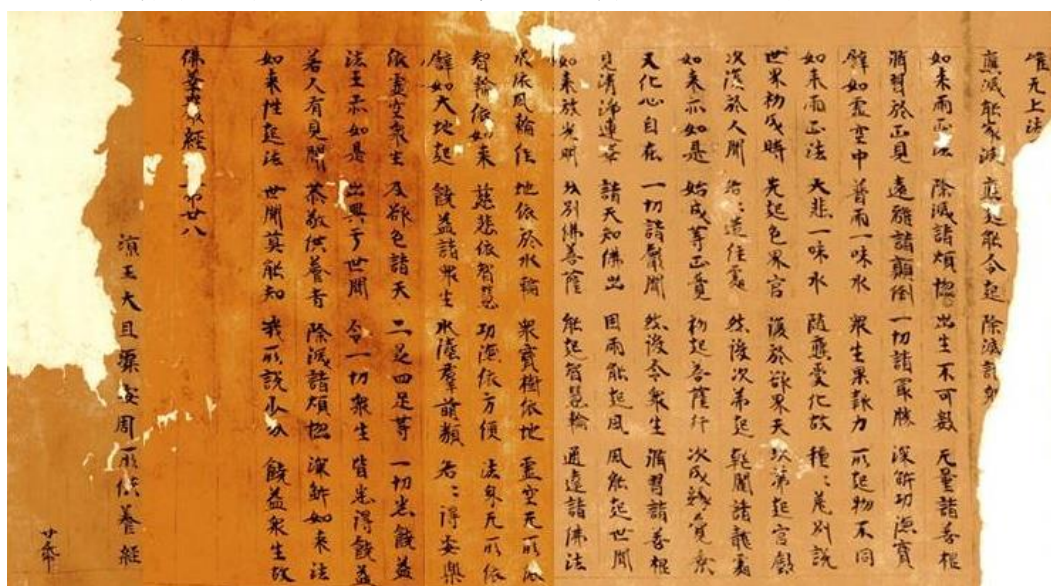
圖一、S.996, 479 年《雜阿毗曇心經·卷第六》局部放大

圖版來源：http://idp.bl.uk/database/database_search.a4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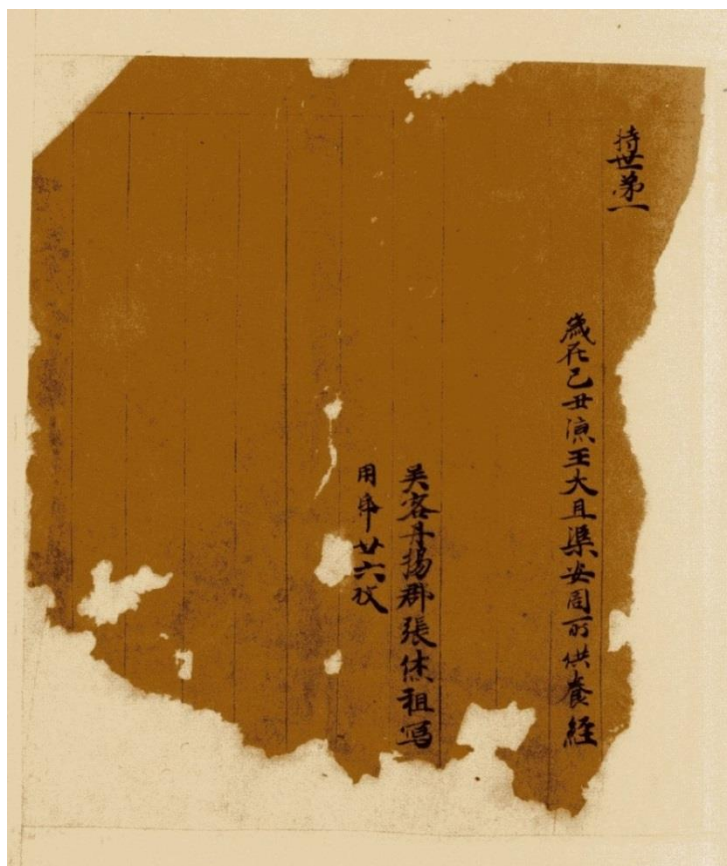
(IDP International Database Project)



圖二、北涼 涼王大且渠安周供養《佛華嚴經卷第廿八》，紙本墨書，鄯善出土，長一尺七寸，存字 22 行。 444—460 年，日本書道博物館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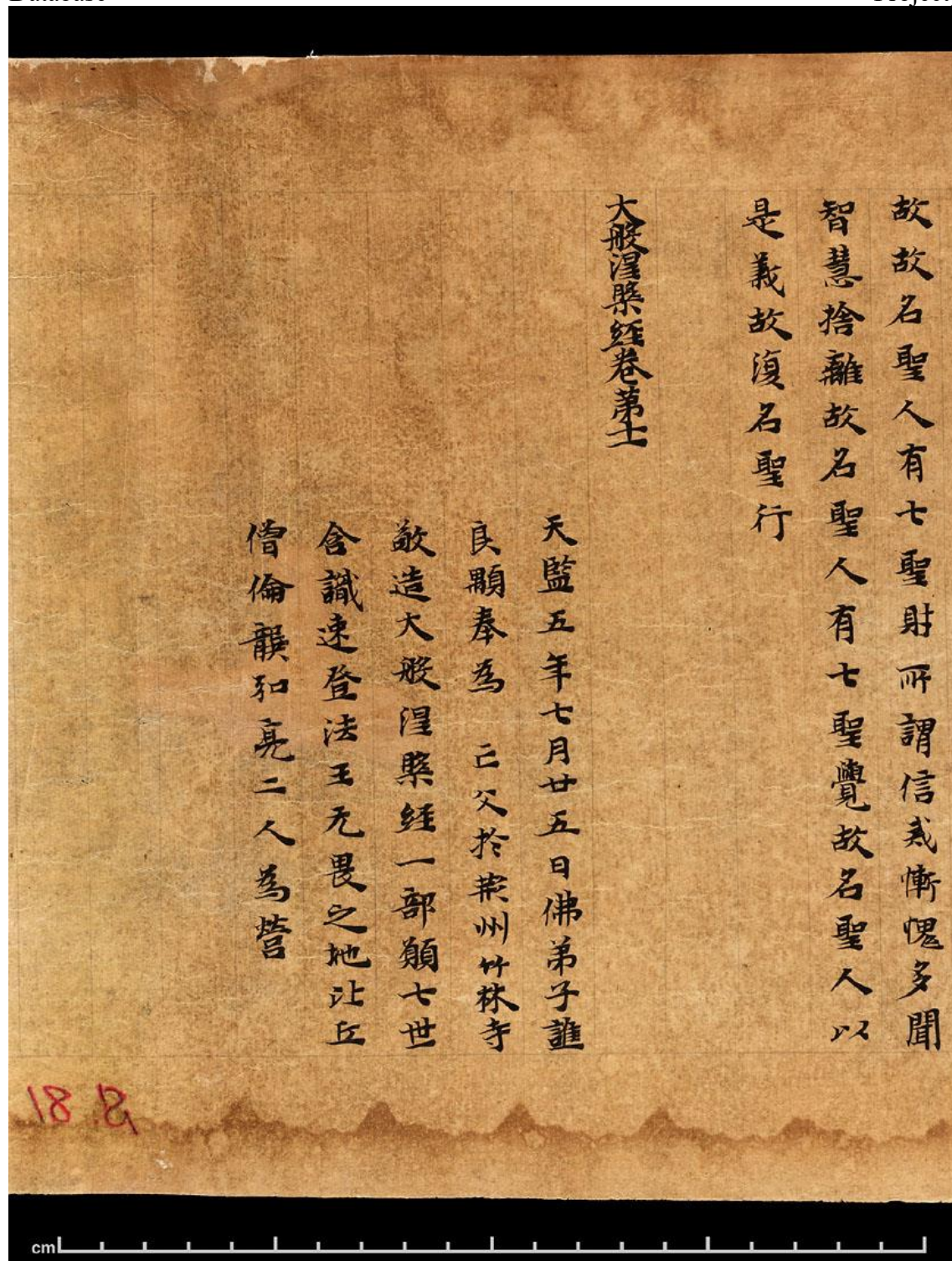


圖三、且渠安周所供養《持世經》第一，紙本墨書，（247 x 219 mm）
圖片來源：《台東區立書道博物館所藏中村不折舊藏禹域墨書集成》V.1,p.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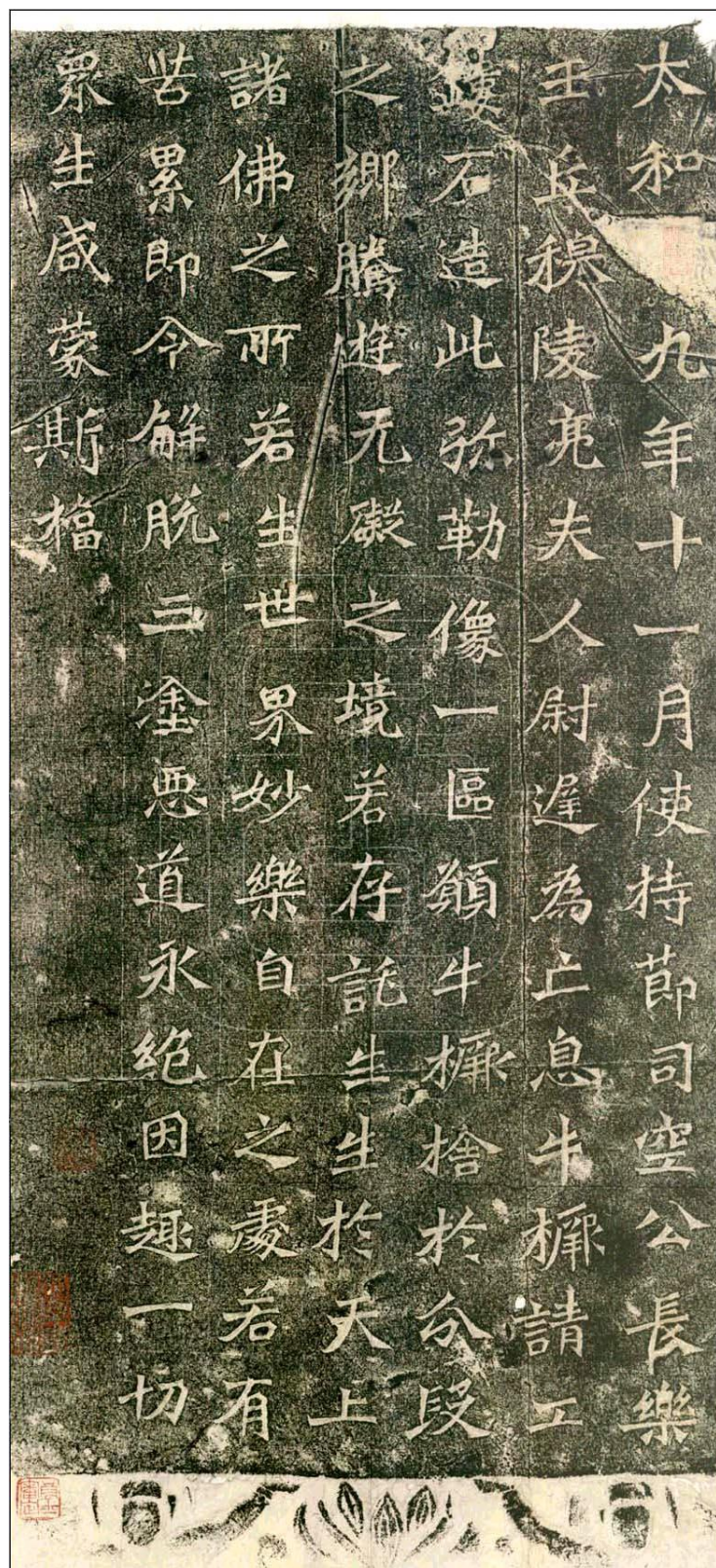


圖四、S.81, 506 CE 《大般涅槃經》譙良顯寫

圖版來源：http://idp.bl.uk/database/database_search.a4d (IDP International Database Proje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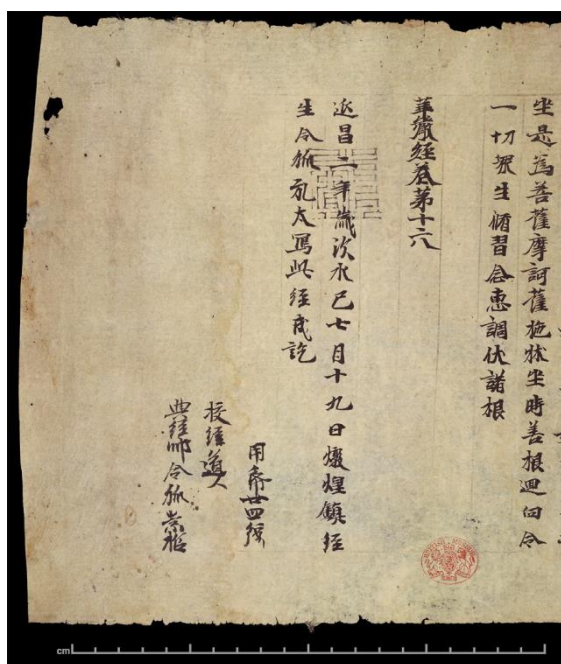


圖五、北魏龍門石窟 495 年《牛橛造像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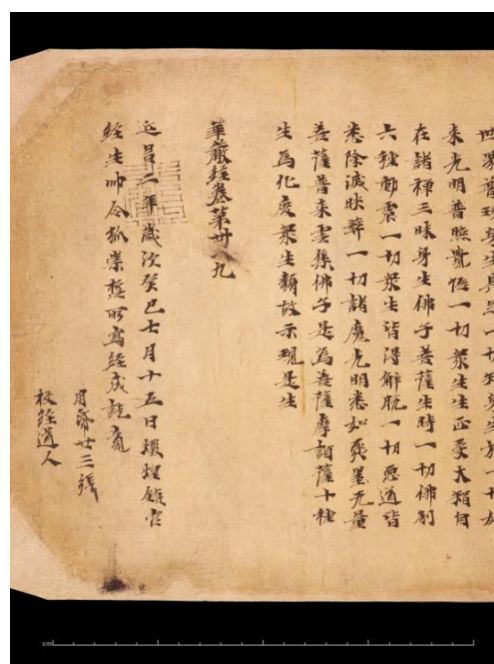


圖六、北涼至北魏佛教寫經書法風格軌跡

449 CE 持世第一	S.737《大般涅槃經》 比丘法威供養	445-449 CE 沮渠安周造寺功德碑	479 CE 雜阿毗曇心經 S.996	506 CE 大般涅槃經	495 年 牛橛造像記
一	一	二	一	一	一
大	大	大	大	人	人
	心	心	心	心	息
歲	城	誠	武	戎	咸
寫	為	為	為	為	為



圖七 S.2067·513 年令狐禮太書寫《華嚴經卷第十六》



圖八 S.9141·513 年令狐崇哲書寫《華嚴經卷第卅九》

圖版來源：http://idp.bl.uk/database/database_search.a4d (IDP International Database Project)

圖九、479 年至 513 年之間北魏寫經書法軌跡與令狐氏族書法比較

敦煌令狐氏族寫經書法風格來源

部首或 常見 詞匯	S. 996 479 CE 雜阿毗曇 心論	495 年 牛橛造像記	S. 81 506 CE 大般涅槃經	S. 9141 513 令狐崇哲寫 《華嚴經》	S. 2067 513 令狐禮太寫 《華嚴經》
一					
心					
大					
佛					
有					
爲					
戈					
說					
一切					